

两广总督府驻肇期间对肇庆府的积极影响

任志强

(肇庆行政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20)

【内容摘要】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两广总督府迁驻肇庆,清乾隆十一年(1746)再迁广州,期间,肇庆作为两广总督府的驻地长达182年。拥有重权的两广总督进驻肇庆,使肇庆成为军事、政治中心,对肇庆府的经济、文化以及城区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,对肇庆府的社会稳定和西江水患的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【关键词】两广总督 两广总督府 肇庆府

中图分类号:K24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1007-9106(2011)06-0122-04

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两广提督吴桂芳“以开府梧州,惠、潮山海寇时发,相去二千里,文檄往来,征调为难,乃徙于肇庆。”^{[1](P191-192)}笔者认为,吴桂芳选择肇庆作为总督府驻地还有两个原因,一是“肇为岭南要郡,其来旧矣。”^{[2](P630)}二是“建两广总督府于郡城中,岂非以襟五岭,带三江,综两粤咽喉,为东南扼要之地哉!”^[3]明清时期,肇庆府辖区比今天肇庆市辖区大得多。明洪武初年(1368)改称肇庆府,辖境扩大至十一个县和一个州,直属县有:高要(府治)、四会、广宁、开平、恩平、阳春、阳江、新兴、高明、德庆州及其所领的封川和开建二县(现已合并为封开县)。清代仍称肇庆府,其辖境比明代增多鹤山一县,即辖十二县一个州。两广总督府迁驻肇庆,到清乾隆十一年(1746)再迁广州。期间,肇庆作为两广总督府的驻地长达182年。两广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力,明代总督的职责有调度兵马,布置方略,节制文武,修饬封疆,“晓谕边夷”;总督漕运、钱粮,总理河道。清代两广总督的职权更大,包括军事、行政、司法、财政及密折奏事等方面。拥有重权的两广总督对肇庆府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。

一、提升肇庆的城市建设

“两广总督部院署在府城东门内,”“总督吴桂芳改建正堂五间,穿廊一间,后堂五间,左右耳房各五间。隆庆五年(1571),总督李迁建谷阴亭于内署。万历五年(1577),总督凌云翼重建后堂五间,名曰广益,东西廊各七间,为大观楼;西为读书楼,亦各五间;又建仪门大门各两间,门外左为坐营司赏功所,右为中军厅火药局。万历八年(1580),总督刘尧诲重建正堂、廊房及内署。万历十六年(1588),乃移署于广益堂之后,而以旧署为广益堂,改建读书楼。崇祯十二年(1639),总督张镜心改建文来阁辟射圃。国朝康熙八年(1669),总督周有德重建寿远楼运寿堂。九年(1670),总督金光祖重修。”^[4]原来肇庆府城墙较低,崇祯十四年(1641),

将城墙筑高0.35丈,并改筑4门月城和增筑马路,“巍然为一方巨镇。”^{[5](P5)}可见,两广总督进驻肇庆,对肇庆的城市建设有重大提升作用。总督府移驻省城后,总督府“自后失修,渐就倾圯。”^[4]

西方传教士曾描述过明末肇庆府城的美丽、气派、雄伟和安全,他们说,这座城“完全被高厚的城垣所围绕,在城垣以内,尽是堂皇宽阔的房屋,道路是非常的优美,不但是宽阔、远长,而且是笔直,从街的这一端可以看清在街的那一端的行人。到处是五光十色的美丽的牌坊,它们的距离,都是按照由风俗习惯而规定的长度。在每座城门上,有一处极雄健的炮楼。围绕着城垣的四周,有一条深湛的小河,时常有炮船或军舰在其中巡逻,护城河的深度,是这样的高强,就是最大的炮舰,也能靠近城的身边。在城的对面江心中,有一座秀丽的孤岛,中间有一道用石质及木材造成的大桥,但在石质筑成的一段里,为外客预备的寓所,就有三十所以上。”至于“肇庆府城内的风景”,“是十分富于兴趣的:它是充满了种种最悦目的绿草、灌木和果树,到处都可遇到花园、鱼池及休憩的处所。”“城外有多处极清凉之郊野,浓荫遍地,景色宜人”,还有“供休憩的花园和布置精美的园林”,“是中国南部最清秀最清洁的一个城市”,“居民约一万二千户。”^[6]

二、建立完善肇庆府地方政权

明成化十一年(1475),置高明县。成化十四年(1478),置恩平县。弘治十二年(1499),两广总督邓廷瓚奏准以新会西南角温边、白石诸瑶村立新宁县(今台山)。明嘉靖三十六年(1557)至三十八年(1559),两广总督谈恺、王钊先后袭杀大小罗山瑶民冯天恩、李汝端、陈世豪、卓文昌、马五奇等8600余人,在其地设广宁县。明万历五年(1577),两广总督凌云翼平定罗旁后,于东、西二山分置东安(今云安县)、西宁(今郁南县)二县,将原属德庆州辖的泮水县,改名罗定,以记

* 作者简介:任志强(1966-),男,肇庆行政学院副教授,历史学硕士,研究方向为明清史。

平定罗旁之功,并升格为省直隶州,再于二县立封门、南乡、富霖、函口等四千户所,调军防守,改惠州仲威道副使为岭西兵巡,其金事为泷水兵备,移德庆守备于罗定,改广韶、高肇陆路二参将分驻东、西二山,加强对罗旁地区的军事控制。清顺治六年(1649),析广州之新会及新兴、恩平两县,地增置开平县,雍正十年(1732),析新会、开平二县,地增置鹤山县。^[7]

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完善,对稳定肇庆府的社会秩序,促进肇庆府的开发具有积极的作用。

三、稳定肇庆府的社会治安

明中期以来,在岭南以广西大藤峡为中心的“僮乱”波及到粤西,平定“僮乱”成为两广共同面临的问题。因“两广军门取钱粮于广东,资劲兵于西粤,兵食相济,安攘兼资。”^[8]同时,“因巡抚事权轻而各镇兵马难于调遣,又设总督都御史。”^[9]成化五年(1469),左副都御史韩雍总督两广军务,“开总府于梧州,”称“总制百粤之堂”^[10]。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两广提督吴桂芳将总督府从梧州迁至肇庆后,驻肇两广总督对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始终保持积极镇压态势,从而稳定了肇庆府的社会秩序。

著名的镇压行动有:万历四年(1576)十一月,提督两广军务凌云翼在罗旁“计克瑶、佞贼巢五百六十四处,擒斩、俘获、投降、夺回共四万二千八百有奇”。此外,“冻馁、焚死者不计。”^[11]嘉靖二十三年(1544)十月,封川僮苏公乐、张公蕊等“盘据山穴,劫杀日甚”,两广总督张岳“调汉达、土兵四万八千六百余名,分左右二大哨剿之,俘斩二千五百余名”。^[12]嘉靖二十七年(1548),提督两广侍郎张岳等调广西土兵及两广汉达官军、民兵7万余人,并檄湖广会兵夹攻,始“大破平之,擒斩三千一十九级、俘获二百八十六人”^[13]。清康熙四十年(1701)十二月,康熙命都统嵩祝赴粤“征瑶”,两广总督会同行事。翌年二月,嵩祝统粤、桂、湘三省水陆军克连州三江口(今连南瑶族自治县县治),杀死李贵等多名首领,“征剿”取得胜利。

四、沟通陆运、水运交通

万历年间,两广总督凌云翼曾在粤西建立起以罗定为中心,的粤西新驿道。其驿道驿站分设如下:移德庆寿康驿至泷水入西江口之南江口(今郁南县南江口镇),仍名寿康驿,新设晋康驿(今郁南县连滩镇);原有泷水驿(今罗定市城区内);自罗定南行约七十里,新设朗沟驿(今罗定市太平镇);南行八十里,新设平豆驿(今信宜县合水镇);南行八十里,新设掘峒驿(今高州市马贵镇);南行一百里,新设大陵驿(今茂名市);南行一百二十里,即接上原肇庆至高州驿道中的古潘驿。^[14]

从广州到湖南、西南重要的水上商路,从广州出发,经肇庆、德庆、梧州,再沿漓江,经灵渠到达洞庭湖,从梧州浔江向西,可达云南、贵州以及巴蜀。其中桂林府属的灵渠和临桂陡河的疏浚维修,对保证湖南的粮食接济广东方面具有不小的意义,雍正九年(1731)总督鄂弥达、乾隆十九年(1754)总督杨应琚,都主持对灵渠进行较大规模的整治。乾隆年间,杨应琚主持了对临桂陡河的整修,并和灵渠一样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善的管理办法。^[15]

雍正四年(1726)秋,广、肇、惠三府有十一县遭水灾,米价飞涨。两广总督孔毓珣上言:“广西桂林、梧州、南宁、柳州、郁林、宾州六府州共贮捐谷一百七万七千四百余石,出粟之谷所存尚多。……请先拨三十万石运交广东。以四万石贮肇庆府仓,以二十六万石贮广州省仓。临期酌粟,于民有济。”^[16]雍正帝批准了孔毓珣的奏议。雍正五年三月,三十万石西谷运到肇庆府仓和广州省仓,“广东米价遂平”^[17]。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,两广总督陈宏谋道出了广西米运往广东的事实:“广东一省,非山即海,田地本少,烟户繁庶,每年食米全仗广西运贩接济。”^[18]因此,肇庆“当两广之冲”,是沟通两广水路交通的中心,也是两广商品交流的转运站。

五、治理西江水患

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,“诸堤尽决,总督张鸣冈、知府江中楠督民修,捐俸分给之。”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“大榄堤决,总督张鸣冈捐金修之。”万历四十四年(1616)大水,高要景福等堤围被谁冲溃多处,修复工程由总督周嘉谟、巡抚田生金主持下,召集人夫数万,历时四月,共修圩堤三十九围,填决口一百六十有七,补筑崩陷三万八百余丈,费币金八千九百两,由“官六民四”分担。^[19]

清雍正五年(1727),总督阿克敦责令地方官要“每岁于农隙之时督率乡民分工修补。倘遇江水上涨,不时遣官巡查,以防冲决。”^[20]清乾隆元年(1736),两广总督鄂弥达上疏言,“广、肇二属沿江一带基围,关系民田庐舍,前经分设各属水利人员动项岁修,然基围皆系土筑,每年不过增高培厚,险要之地,大水常致冲坍,……欲除大患,莫如建筑石堤。”建议将堤围“顶冲险要者,先筑石工,以资捍御。次冲者陆续兴建”。具体改建办法是,“用坚厚石条,凿笋合缝,逐层镶嵌,灌以油灰,务使满足石条五层,再用铁锭上下牵搭,不致动摇,务令如式修筑,不使潦草塞责。”^[21]工部同意其所请,“将广州所属围基,责令广、南(雄)、韶、连道,肇庆所属围基,责令肇、高、廉、罗(定)道,督率水利各官,即行雇募工役,分别首险、次冲办理。”^[22]江防工程“已建石工尚属坚固,培修工程亦可保护田庐。”^[23]总之,改土为石工程大大提高了西江堤围的抗洪能力。清乾隆七年(1742),中央政府认为官修负担过重,又要求广东政府仍改为民修。两广总督庆丰建议,将“已建石工,与民修土工,一并交地方官,督率围民防护”,既不全为官修,也不完全为民修,地方官于“农隙时,督民培修”,如堤围冲决,小的缺口由围民“自行修补,永着为例”,若大的溃决,“民力不支”,由官方给予支持。^[24]

因此,可以说两广总督在治理西江水患上功劳大矣。

六、促进经济发展

明清时期,政府一直鼓励垦荒,明代中央政权开发广东瑶区社会经济的核心内容为招募流民,垦殖荒地,发展农业生产。隆庆、万历年间,经殷正茂、凌云翼、刘尧梅三位两广总督的大力经营,广东瑶区进入社会经济开发的高潮。^[25]清顺治十四年(1657),清政府《垦荒劝惩则例》规定:“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记录,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。……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,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。”^[26]该规定促进了垦荒工作的进行。清代两广总督从孔毓珣到阿克敦、鄂弥达、郝玉麟等,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除弊兴利的劝

垦措施,以至于广东“劝垦之条屡颁”。广东的劝垦办法有五:一是定疆界以绝争端;二是禁需索以宽民力;三是借给粒种以助农工;四是轻升科以示优恤;五是广招徕以尽地利。^[27]为了鼓励土地开垦,清政府实行了更优惠的政策。乾隆十年(1745)十月,两广总督策楞奏请开发高雷廉荒地。乾隆十一年(1746)上谕称:“广东高、雷、廉等府属,勘出可垦荒地大抵山冈硗瘠者居多,开垦原非易事。……今高、雷、廉三府查出可垦山场荒地……令该地民人垦种,一概免其升科,并令敌方官给予印照,永为世业,以杜纷争强占之弊,俾小民咸知有利无累,踊跃开辟。”^[28]到道光年间,上述优惠政策推广到肇庆、广、惠、潮、韶、嘉应、罗定、南雄、连等9府州援引实行。^[29]

两广总督驻肇期间,肇庆城区的经济相当繁荣。明神宗万历四年(1576年),两广总督凌云翼“于肇庆城南门外设黄江税厂检验并交纳税金,随撤销泷水口税卡。”^[30]万历十二年(1584),总督吴文华递减旧税,著为令商民大悦。^[31]黄江税厂的设立,表明肇庆成为沟通粤西山区与珠江三角洲地区水运交通的中心,集散于肇庆的客货日益增多。清代“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两广总督吴兴祚于肇庆府城开铸钱局,”^[32]肇庆成为两广钱币发行中心。清末有人追记:“那时商业之交通,亲朋之酬酢,莫不以肇庆为中心,彼此往来,全持帆船,以故夹岸下碇,帆樯如织,而舵工舟子之属赖以谋生者辄数千人,肇河水面之繁盛固可念也”^[33]

七、促进教育发展

两广总督对教育事业的促进主要在清代。“清康熙四十七年(1708),两广总督赵宏灿在鼓铸局旧址复建书院,取名“天章”,为总督课士之所,选招两广之士肄业其中,天章书院当时的建筑格局是前为讲堂,堂上为天章阁,又名天阁。中为宣教堂共五间,堂后偏东为莲池,池后为近光亭,东西为斋舍。”^[34]清代雍正十一年(1733),皇帝颁布上谕:“督抚驻之所,为省会之地,着该督抚商酌奉行,各赐帑金一千两。将来士子群聚读书,须预为筹划,资其膏火,以垂永久。其不足者,在于存公银内支用。”^[35]雍正十二年(1733),两广总督郝玉麟曾奉旨赏拨地丁银1000两发商生息,每年息银240两、闰年增20两,以供生徒膏火,后再拨盐羨银2000两发商生息,每年息银480两给天章书院,并对书院加以修葺。郝玉麟还亲往授课,延聘名儒,捐银二千两,不遗余力。经过此番努力,“近来学老云集”,“负笈者众,德造之盛遂为前代所无。”^[36]清代乾隆三年(1738),两广总督马尔泰改天章书院为端溪书院。此后,端溪书院多次得到修葺。乾隆二十年(1755),两广总督蒋攸对书院加以修葺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)两广总督阮元对书院给以捐修。“在两广总督府驻于肇庆期间,端溪书院可招两广学子入学,为省级书院,一度曾是两广规模最大的学府。”^[37]

对于府学或其他书院的创建,两广总督也作出了很大贡献。“肇庆府学在城东一里。”“嘉靖六年(1527),总治两广新建伯王守仁,饰堂斋之不称者。十年(1531)始奉制易大成殿,曰先师庙;建启圣祠;又建敬一亭。”“嘉靖十二年(1533),督御史吴桂芳乃于庙后建尊经阁。”“万历十九年(1591),总制刘继文捐赎醵六百两。”康熙十一年(1672),

总督两广部堂金光祖等捐修府学。^[38]明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两广总督吴桂芳创建仰湖书院,明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总督陈大科创办庆云书院,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,两广总督戴暇创办景星书院。康熙三十九年(1700),总督石琳将七星岩水月宫左边的熊公祠改为星岩书院;松台书院是总督周有德、金光祖、杨宗红、杨文乾、鄂弥达将阅江楼右边的三公祠改建的。^[39]

八、促进文化交流

两广总督驻肇期间,肇庆府是“两粤人文所交会”^[40]之地。仅在七星岩石崖就刻有许多外地的官宦文人留下的题咏石刻。如明成化十四年(1478),广东按察副使闵珪在莲花洞留有诗一篇,其中记载“大将军参戎杨公邀予游七星岩”。明正德八年(1513),官员汪鋐、冼光在璇玑台左壁书有唱和石刻。正德十一年(1516),福建按察副使黄昭在璇玑台左壁书有题咏石刻。明嘉靖三十七年(1558),分守广东左参将钟坤秀,“延大参自湖翁吴老先生来游,”在石室岩石鼓壁留有题咏石刻。嘉靖三十八年(1559),广东右布政使雷贺在石室岩石鼓对壁书有题咏石刻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),俞大猷在璇玑台右壁高处书有题咏石刻,同年,翁梦鲤与许公高游七星岩,在石室岩石鼓对壁书有题咏石刻,同年,广东右参政程宝在石室岩石鼓对壁书有题咏石刻。明隆庆二年(1568),广东巡抚熊桴在石室岩石鼓对壁书有题咏石刻,同年,官员张瀚同中丞熊镜湖游在璇玑台左壁书有题咏石刻,同年,桂嘉孝在璇玑台左壁书有题咏石刻。隆庆三年(1569),建宁同知吴国伦同熊德甫在石室岩石鼓对壁石壁下书有题咏石刻。万历元年(1573),广东参议詹仰庇与文人黄克晦在石室岩石鼓壁书有题咏石刻。万历六年(1578),广东副使赵志皋在石室岩石鼓对壁书有题咏石刻。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曾任南京户部侍郎的区大伦在玉虚宫遗址东侧留有题咏石刻。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广东海南文人朱完在水月宫西侧岩麓书有“帝觞百神之所”,同游的还有安徽桐城人刘胤昌。崇祯十年(1637),郑芝龙在璇玑台左壁书有题咏石刻。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文人晓山道人在石室洞口北海亭西侧书有题咏石刻,同年,真际道人于石室岩东壁书有题咏石刻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),吴绮与屈大均等聚会于玉屏岩,在璇玑台左壁留有石刻。清乾隆四十三年(1778),提督广东学政李调元在水月宫西侧岩麓书有题咏石刻。^[41]这些石刻代表着游历肇庆的官员和文人众多,他们中的很多人大概是奔着两广总督府来的,因为两广的官员,“每月或至多每两月,都要到这里来拜见总督,再添上各上任及去任的新旧职官,也都要和总督见面,所以来来往往的人非常众多。”^[42]“为外客预备的寓所,就有三十所以上。”^[42]因此,众多名人莅临肇庆,会促进文化的交流。

肇庆府也是“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第一座城市。”^[43]正是由于两广总督驻肇,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才在1583年9月抵达肇庆,两广总督批准他们在城中选地建造教堂,地址是在城东崇禧塔附近。^[44]罗明坚和利玛窦把圣母像、三棱镜、钟表、日晷以及一幅世界地图在教堂展示,明代各阶层人士前往参观。所以说,明代驻肇两广总督允许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驻肇六年,开创了中西文化的大交流。

两广总督府迁驻肇庆,也促进民族的融合。征调到肇庆的将士中,有大批回族人,他们最后大多落籍肇庆,成为后来肇庆回族的主体。据道光《肇庆府志》记载,清初肇庆城内曾设“回族营”,“在城内东北隅,东抵清真寺,西至巡凤厅左,共营房八十五间。”“明朝政府曾从桂西调来不少佯兵在两广地区屯田戍守,这些佯兵原是壮族,后来也强征部分瑶族,经过几百年民族之间的通婚和交往,绝大多数的佯兵被同化了。”^[45]

总之,两广总督府进驻肇庆,使肇庆成为军事、政治中心,对肇庆府的经济、文化以及城区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,对肇庆府的社会稳定和西江水患的治理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[清]阮元监修,李默校点.广东通志·前事略[M].广东人民出版社,1981.
- [2]谭棣华,曹腾骅,冼剑民编.广东碑刻集[M].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,2001.
- [3]光绪.肇庆府志(卷1).卷首·序.重修肇庆府志序.
- [4]道光.肇庆府志(卷5).建制·廨署.第708叶.
- [5]蒋祖缘.明代广东的省城与府城建设[M].广东史志,1999(5).
- [6]裴化行著,肖浚华译.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(第四章)[M].商务印书馆,民国二十五年(1936).
- [7]光绪.肇庆府志(卷1).舆地·二·沿革.
- [8][清]吴桂芳.奏设练兵游击疏略.道光.高要县志(卷9).
- [9][清]吴时来.目击时艰乞破常格贵实效以安边御虏保大业疏.明经世文编(卷384).
- [10][清]韩雍.总府开设记.明经世文编(卷55).
- [11]康熙.广西通志(卷29).瑶僮.
- [12][清]朱若迄.剿瑶再奏疏.民国.连山县志(卷14).瑶排志“附录”.
- [13]明武宗实录(卷79).正德六年(1511)九月乙酉条.
- [14][清]凌云翼.奉命大征功已垂成并预计善后之图以保久安疏.[清]刘尧梅:苍梧总督军门志(卷26).
- [15]唐兆民.灵渠文献粹编[M].中华书局,1982:230.
- [16]乾隆.肇庆府志(卷13).蠲恤.
- [17]道光.高要县志(卷18).宦绩录.
- [18][清]陈宏谋.平类买谷第二疏.乾隆.广州府志(卷55).艺文5.
- [19]光绪.肇庆府志(卷4).舆地·水利.
- [20]肇庆市端州区水利局水利志编写组编.肇庆市端州区水利志[M].1990:46.
- [21]洪涝档案.第65页.乾隆六年(1741)五月,广东巡抚王安国奏.
- [22]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等编.清实录广东史料(第1册)[M].广东省地图出版社,1995:373.
- [23]清高宗实录(卷183).乾隆八年(1743)正月甲申.
- [24]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等编.清实录广东史料(第1册)[M].广东省地图出版社,1995:471.
- [25]颜广文.明代广东地区民族政策的演变与瑶区社会经济的发展[J].华南师范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1996(5).
- [26]清世祖实录(卷109).顺治十四年(1657)四月壬午.
- [27]朱批奏折.雍正五年(1727)七月初一日署广东总督阿克敦奏.
- [28]清高宗实录(卷262).乾隆十一年(1746)闰三月辛丑.
- [29]光绪.广州府志(卷70).经政略·附奏定开垦山场荒地章程.
- [30]刘伟铿,吴咏平编著.肇庆历史风貌[M].广州文化出版社,1989:128-129.
- [31]道光.肇庆府志(卷22).事纪.633.
- [32]肇庆地方志办公室.肇庆大事记.1994:34.
- [33]宣统.高要县志(卷11).
- [34]道光.肇庆府志(卷6).第4叶.
- [35]续会典事例.转引自章柳泉著《中国书院史话》[M].教育科学出版社,1981:34-35.
- [36][清]黎佩兰.端溪书院志(卷1-5).
- [37]王献军.端溪书院史话[M].广东史志,2002(2):43.
- [38]道光.肇庆府志(卷6).第1叶.
- [39]光绪.肇庆府志(卷6).建置·学校.
- [40][清]赵长龄.重修端溪书院碑记.宣统.高要县志(第12卷).第6叶.
- [41]肇庆市文物志编辑委员会编.肇庆市文物志[M].1987:26-74.
- [42]裴化行著,肖浚华译.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(第五章)[M].商务印书馆,民国二十五年(1936).
- [43]曾峥.对“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”命题的若干思考[J].数学教育学报,2007(2):35.
- [44]道光.高要县志(卷15).古迹.
- [45]姚舜安.明代岭南民族关系概述[J].广西民族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,1987(4):125.